



《辽史·西夏外记》“西夏纪事”探源

陈晓伟

摘要: 冯家昇先生指出《辽史·西夏传》有部分内容与《宋史》同出一源,即叙述西夏国远祖事、物产及军制等资料取资宋代文献。本文通过进一步探求其史源,发现这些资料在转抄过程中有着诸多讹误和混乱。

关键词: 《辽史·西夏外记》; 西夏; 史源

《辽史》卷一一五《西夏外记》系统汇集了辽代西夏史料,作为其主体内容的辽夏交聘资料见于《辽史》诸帝纪,然而纪西夏人物制度、风俗居食、军事战斗等事(以下概称作“西夏纪事”)则不见于辽代文献的记载。冯家昇先生指出这部分内容与《宋史》同出一源,惟《辽史》简略,《宋史》详明耳。^①换言之,元朝史官在编纂《宋史》和《辽史》“西夏传”时曾有部分史料取材一致,即两者有着共同的史源。胡玉冰先生认为,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叙夏国远祖事、物产及军制等资料主要采自《隆平集》。^②后来,熊伟华博士也提出同样的观点。^③根据这些研究,我们基本能肯定《辽史》“西夏纪事”乃是采据宋代文献。本文拟在此基础上,期许厘清《辽史·西夏外记》“西夏纪事”所存在的问题及推测其史源。

—

我们将《辽史·西夏外记》“西夏纪事”部分与《宋史·夏国传》及《隆平集·赵保吉传》逐一比对,就会发现《辽史》之记载存有若干处脱简和乖谬。兹举几例:

例一,纪西夏远祖事。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云:“远祖思恭,唐季受赐姓曰李,涉五代至宋,世有其地。至李继迁始大,据夏、银、绥、宥、静五州,缘境七镇,其东西二十五驿,南北十余驿。”^④《宋史·夏国传》则谓:“唐末,拓跋思恭镇夏州,统银、夏、绥、宥、静五州地,讨黄巢有功,复赐李姓。”^⑤由此记载可知,始“据夏、银、绥、宥、静五州”者实际上是拓跋思恭。尔后,李继迁“收临河五镇,下缘境七州”。^⑥《隆平集·赵保吉传》又云“至德明,攻陷甘州,拔西凉府,其地东西

① 冯家昇《辽史正误三种》,中华书局 1959 年,第 325 页。

② 胡玉冰《西夏史书与三史的〈西夏传〉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2001 年第 2 期;又见氏著《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,第 51、193、194 页。

③ 熊伟华《〈隆平集〉研究》,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论文 2008 年,第 174 页。

④ 《辽史》卷 115《西夏外记》,中华书局 1974 年,第 1523 页。

⑤ 《宋史》卷 485《夏国传上》,中华书局 1985 年,第 13982 页。

⑥ 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以下简称《长编》)卷一二三,宝元二年正月辛亥条,中华书局 2004 年,第 2894 页。此文亦见《宋史·夏国传》,谓李继迁“心知兵要,手握乾符,大举义旗,悉降诸部。临河五郡,不旋踵而归;沿边七州,悉差肩而克”。

二十五驿、南北十驿，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，而达契丹之境”。^①即知西夏保有“东西二十五驿，南北十余驿”实自德明始。参以宋代文献，足见《辽史》此处叙事之粗疏，不免使人坠入迷雾。

例二，纪元昊事。实际上，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“西夏纪事”并没有明确提及到“元昊”的名字，止云：

德明，晓佛书，通法律，尝观《太一金鉴诀》、《野战歌》，制番书十二卷，又制字若符篆。……自号嵬名，设官分文武。其冠用金缕贴，间起云，银纸帖，绯衣，金涂银带，佩蹀躞、解锥、短刀、弓矢，穿靴，秃发，耳重环，紫旋襴六袂。出入乘马，张青盖，以二旗前引，从者百余骑。民庶衣青绿。^②

首先，冯家昇先生据《宋史·夏国传》记载，指出“制番书等事，《宋史》为元昊，非德明”。^③其次，我们参照《隆平集·赵保吉传》^④及《宋史·夏国传》，可知《辽史》在描述元昊革新西夏官服时曾省却诸多文字，以致内容语焉不详。按《辽史》“其冠用金缕贴”云云系指武职之服饰，而缺载文资冠服，即“文资则幞头、靴笏、紫衣、绯衣”。^⑤并且《辽史》在叙述武官与庶民衣着文字之间，径植入“出入乘马，张青盖，以二旗前引，从者百余骑”之语。此文详见《宋史·夏国传》，谓“少时好衣长袖绯衣，冠黑冠，佩弓矢，从卫步卒张青盖。出乘马，以二旗引，百余骑自从”。^⑥实系元昊少时风貌，而《辽史》却误置于此处。综上考察，可知《辽史》自“晓佛书”至“民庶衣青绿”句均是在叙说元昊及其相关事迹，但却未提及“元昊”之名，其内容也是混乱不堪。

例三，纪西夏物产。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谓：“土产大麦、荦豆、青稞、慵子、古子蔓、咸地蓬实、苳蓉苗、小茺萸、席鸡草子、地黄叶、登厢草、沙葱、野韭、拒灰苲、白蒿、咸地松实。”^⑦这则材料并不见于《宋史》。故而就其史料价值，胡玉冰先生认为该处记载为其他史籍所罕见；^⑧白滨先生、杨浣博士亦持类似的观点。^⑨实际上，《隆平集》对此事叙述要更为全面一些，该书卷二〇《赵保吉传》云：

西北少五穀。军兴粮馈止于大麦、荦豆、青麻子之类。其民则春食鼓子蔓，醎蓬子；夏食苳蓉苗，小茺萸；秋食席鸡子、地黄叶、登厢草；冬则畜沙葱，野韭，拒霜、灰苲子、白蒿、醎松子，以为岁计。

由上可知，《辽史》将西夏的军粮和民食作为其“土产”来记述，并且删削了示以“岁计”的“春食”、“夏食”、“秋食”、“冬则畜”等字句。

当然，《辽史·西夏外记》“西夏纪事”所存在的舛误远不止于以上三例。若仔细阅读这段文字，还能发现诸多脱漏或倒误之文。例如，该卷叙述西夏兵制云“团练使上，帐、弓、矢各一，马五百疋，橐驼一，旗鼓五，枪、剑、棍棒、杪袋、雨毡、浑脱、锹、镞、箭牌、铁策篱各一”。此处谓“矢一”，

① 曾巩《隆平集》卷20《赵保吉传》，赵铁寒主编《宋史资料萃编》第一辑，文海出版社（台北）1967年。

② 《辽史》卷115《西夏外记》，第1523页。

③ 冯家昇《辽史正误三种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，第325页。因此段史料牵涉到西夏文字的创制时间问题，向来为西夏文研究者所关注。史金波先生曾专文讨论“创制西夏文的歧说”，指出该书与北宋曾巩《隆平集》等书有关记载颇多重复，只是把“元昊”误抄为“德明”，进而否定了西夏文创自德明说。参见史金波《也谈西夏文字》，《历史教学》，1980年第1期，后收入氏著《西夏文化》，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，第11-12页。

④ 《隆平集》卷20《赵保吉传》。

⑤ 《宋史》卷485《夏国传上》，第13993页。

⑥ 《宋史》卷485《夏国传上》，第13993页。

⑦ 《辽史》卷115《西夏外记》，第1524页。

⑧ 胡玉冰《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》，第193页。

⑨ 李锡厚、白滨、周峰《辽西夏金史研究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，第132页。该书第二编《西夏史研究》系由白滨先生执笔。杨浣《辽夏关系史》，人民出版社2010年，第5页。

而马却“五百疋”，这显然不合事理。《宋史·夏国传》记载是这样的：“团练使以上，帐一、弓一、箭五百、马一、橐驼五，旗、鼓、枪、剑、棍棒、炒袋、披毡、浑脱、背索、锹镢、斤斧、箭牌、铁爪篱各一。”^①那么，《辽史》“矢一，马五百疋”就应该是“矢（或作“箭”）五百、马一”，另外“橐驼”和“旗鼓”的数目亦有互倒，当从《宋史》作“橐驼五”、“旗一”。此外，《辽史》还漏掉了“背索”“斤斧”等军具。再如，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谓“有炮手二百人，号“泼喜”。勇健者号“撞令郎”。单从此处记载看，“泼喜”和“撞令郎”似乎都是西夏兵士的称谓，实则不然。检《宋史》，谓“有炮手二百人号‘泼喜’，陡立旋风炮于橐驼鞍，纵石如拳。得汉人勇者为前军，号‘撞令郎’。若脆怯无他伎者，迁河外耕作，或以守肃州”。^②可知，“撞令郎”所指称的“勇健者”实际是汉人，而非西夏人。

《辽史》“西夏纪事”之所以出现上述如此多的问题，乃是元朝史臣转抄史料不周所致。不过，要从根本上梳理“西夏纪事”之原委，势必要溯求这段材料的最初来源，即进一步考析元人在编修《辽史》时所撷取的史料到底有哪些。

二

上文已辨明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所存在的疏漏。从《宋史》和《隆平集》的相关记载来看，其中“西夏纪事”无疑比《辽史》详细很多。我们据此初步判断，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“西夏纪事”可能是依据宋朝史料编撰而成。当然，我们并不能轻率地否定它亦参考辽人著述的可能。

冯家昇考究《辽史》之取材，谓“今考耶律俨《实录》、陈大任《辽史》二书，至正中尚存，其为脱脱《辽史》之底本无疑。更有宋人所撰之《契丹国志》，亦为脱脱《辽史》所据。则当日成书之易，盖有各家底本以资编排也。”^③检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辽夏交聘之史料，基本同于该书本纪。这部分内容疑系元朝史官根据耶律俨《皇朝实录》或陈大任《辽史》，甚至今本《辽史》的帝纪撮抄而成，^④而“西夏纪事”内容则在此难觅踪迹。

胡玉冰先生还指出，元人修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未言其参考史料，清人黄任恒撰《补辽史·艺文志·史部·载记类》著录有一种《夏国史》，这很可能是一部汉文西夏史书，辽时此书尚存，元人修《夏国传》时不知是否参考了此书。^⑤笔者认为，其答案是否定的。核检黄任恒《辽艺文志》，该书“载记类”确实著录《夏国史》一书，且谓“虞集《斡公画像赞》曰：斡氏其先灵武人，从夏主迁兴州，世掌夏国史”。^⑥此文盖引自元代虞集《道园学古录》卷四《西夏相斡公画像赞有序》。按斡道冲本系西夏仁宗朝重臣，而且此时辽朝亡于女真已数年，黄任恒将其视作辽人，乃误；并且《西夏相斡公画像赞有序》止云道冲“世掌夏国史”，并未明确说他著有《夏国史》传世。由此看来，黄任恒乃将“世掌夏国史”之句错解为书名《夏国史》，遂将其收入《辽艺文志》一书。那么，清代学者所谓《夏国史》是不大可能存在的，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的史源更是与此无关。

从现存的记载来看，《辽史》“西夏纪事”取材辽朝史料的可能性并不大。然而将其与《宋史·夏国传》及《隆平集·赵保吉传》互证，诸者记载则颇为相似。故有学者认为，《辽史》的这部分内容取资于《隆平集》。既然《辽史》“西夏纪事”与《宋史》同源，据此推之，《宋史·夏国传》亦曾参考《隆平集》。果是如此呢？下面将摘取关键内容，试分析之。

例一、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曰：德明（应为“元昊”之误）“晓佛书，通法律，尝观《太一金鉴诀》、

① 《宋史》卷486《夏国传下》，第14028页。

② 《宋史》卷486《夏国传下》，第14028~14029页。

③ 冯家昇《辽史正误三种》，第25页。

④ 参见胡玉冰《西夏史书与三史的〈西夏传〉》、同氏《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》，第194页。

⑤ 胡玉冰《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》，193~194页。

⑥ 黄任恒《辽艺文志》，《辽史汇编》第5册，第51~10页。

《野战歌》，制番书十二卷，又制字若符篆”及“出入乘马，张青盖，以二旗前引，从者百余骑”。^①《宋史·夏国传》曰：元昊“少时好衣长袖绯衣，冠黑冠，佩弓矢，从卫步卒张青盖。出乘马，以二旗引，百余骑自从。晓浮图学，通蕃汉文字，案上置法律，常携《野战歌》、《太乙金鉴诀》”；“自制蕃书，命野利仁荣演绎之，成十二卷，字形体方整类八分，而画颇重复”。^②而《隆平集·赵保吉传》止云元昊“晓浮图法，通汉文字，凡案间常致律法书。自为蕃书十二卷，文类符篆”。^③按上述之例，《辽史》叙元昊事，谓“《太一金鉴诀》、《野战歌》”及“出入乘马，张青盖，以二旗前引，从者百余骑”，此文未见《隆平集》，而略同于《宋史》。

例二、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曰：“其俗，衣白窄衫，毡冠，冠后垂红结绶。自号嵬名，设官分文武。”^④《宋史·夏国传》曰：“始衣白窄衫，毡冠红里，冠顶后垂红结绶，自号嵬名吾祖。凡六日、九日则见官属。其官分文武班。”^⑤除了《辽史》脱“吾祖”二字外，两书所记载的内容大致相同。《隆平集·赵保吉传》则云“曩宵畏之戴，金起云冠，使它无得冠者”。^⑥可见，《辽史》和《隆平集》在此处记载殊异。

例三、前文举证《辽史·西夏外记》谓“有炮手二百人，号‘泼喜’。勇健者号‘撞令郎’。而《宋史》的记述更为详细，谓“有炮手二百人号‘泼喜’，陡立旋风炮于橐驼鞍，纵石如拳。得汉人勇者为前军，号‘撞令郎’。若脆怯无他伎者，迁河外耕作，或以守肃州”。^⑦但是关于这部分内容，《隆平集·赵保吉传》仅有“得中国人无艺者，使耕于河外，或守肃州城，骁勇则刺为军”^⑧寥寥数语。

据以上三例，可以证明《辽史》“西夏纪事”和《宋史》的史料来源的确是相同的，但两者与《隆平集》的记载差异甚大。这显然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，《辽史》在编修时曾参考了《隆平集》。当然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，《辽史》有若干史料并不见于《隆平集·赵保吉传》。例如：《辽史》记述西夏风俗，谓“病者不用医药，召巫者送鬼，西夏语以巫为‘厮’也；或迁他室，谓之‘闪病’”。^⑨以及描述夏人复仇事，和解后的誓词云“若复报仇，谷麦不收，男女秃癞，六畜死，蛇入帐”。^⑩这两则材料仅见于此，而《隆平集》则无这般描述。尽管袁桷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》提供的可备修三史采择者有《隆平集》一书，^⑪但种种迹象表明，《辽史》“西夏纪事”与《隆平集》并无因袭关系。

那如何解释两书记载的相似之处呢？据余嘉锡先生考订，谓《隆平集》“疑是取当时官撰之书，如《宝训》、《圣政》、《会要》及《国史》、《实录》、《日历》之类，择要录出，以备修五朝纪志之用，而未及编纂成书者。”即“未成之稟”。^⑫该书《赵保吉传》可能也是如此。而在“西夏纪事”方面，与《宋史·夏国传》同源的《辽史》虽成书于《隆平集》后，但其依据的也应该是诸如《国史》、《实录》这类原始资料。故两书记述有诸多重合，也说明其史源可能是一致的。

那么，《辽史》“西夏纪事”究竟依据的是哪种宋代文献呢？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辽史·西夏外记》纪元昊事有一则不见于《宋史》之文，即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，裁礼之九拜为三拜。”^⑬按《长编》宝元二年正月辛亥条，云“臣偶以狂斐，制小蕃文字，改大汉衣冠，革乐之五音为一音，裁礼之九拜为

① 《辽史》卷115《西夏外记》，第1523页。

② 《宋史》卷485《夏国传上》，第13993、13995页。

③ 《隆平集》卷20《赵保吉传》。

④ 《辽史》卷115《西夏外记》，第1523页。

⑤ 《宋史》卷485《夏国传上》，第13993页。

⑥ 《隆平集》卷20《赵保吉传》。

⑦ 《宋史》卷486《夏国传下》，第14028~14029页。

⑧ 《隆平集》卷20《赵保吉传》。

⑨ 《辽史》卷115《西夏外记》，第1523~1524页。

⑩ 《辽史》卷115《西夏外记》，第1524页。

⑪ 袁桷《清容居士集》卷41《状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。

⑫ 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，第259、266页。

⑬ 《辽史》卷115《西夏外记》，第1523页。

三拜”，^①此段文字出自元昊给宋朝的上表。此外，这份上表还讲到：

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，拓跋之遗业也。远祖思恭，当唐季率兵拯难，受封赐姓。臣祖继迁，大举义旗，悉降诸部，收临河五镇，下缘境七州。^②

《宋史·夏国传》亦收录此表，^③具体表述则有所不同。我们再比照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，谓“西夏，本魏拓跋氏后，其地则赫连国也。远祖思恭，唐季受赐姓曰李”及“至李继迁始大，据夏、银、绥、宥、静五州，缘境七镇”。^④我们推知，《辽史》歧见于《宋史》的上述两则材料极有可能抄录自宝元二年元昊给宋朝的这份上表。而该份原始资料应保留在宋朝的“实录”或“国史”之中，《辽史》、《宋史》及《长编》的相关内容均可能摘抄自此表。

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，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“西夏纪事”与宋朝“实录”这类文献有着因袭关系。前文引据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来讨论西夏文创制歧说，《长编》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条亦云：元昊“晓浮屠学，通蕃汉文字，案上置法律书，常携《野战歌》、《太乙金鉴》。忽引兵袭夜落隔可汗王，破之，夺甘州。”李焘辨析元昊“引兵袭夜落隔可汗王破甘州”事，云：

《实录》、《正史》并称德明既攻陷甘州，拔西凉府，未踰时乃死。按甘州及西凉府陷没，《实录》、《正史》并不记其年月日，所称未踰时，或即德明死之年。然德明每不听元昊用兵，其攻陷甘州及西凉府，想非德明意。《传》又称元昊忽引兵袭甘州，可见德明不在兵间。西凉府亦必元昊自拔之，德明不与也。《实录》、《正史》载此事不详，因德明死时乃附著之，盖误矣，今皆删修，使不相抵牾，要检寻他书；或载甘州及西凉府陷没时，则别修附。^⑤

可见，《长编》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记叙元昊事当时供以参考的史料有《实录》、《正史》及《传》，然而《实录》、《正史》载此事不详。李焘云“《传》又称元昊忽引兵袭甘州，可见德明不在兵间”。这就清楚地说明，《长编》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纪事所据的史料是《传》。

通过《长编》记载，我们可知李焘引据的《传》，盖即《元昊传》。例如，《长编》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条云：

赵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，字画繁冗，屈曲类符篆，教国人纪事悉用蕃书。私改广庆三年曰大庆元年。再举兵攻回纥，陷瓜、沙、肃三州，尽有河西旧地。将谋入寇，恐唃廝囉制其后，复举兵攻兰州诸羌，南侵至马衔山，筑城瓦川、凡川会，留兵镇守，绝吐蕃与中国相通路。

李焘注云：“元昊无吐蕃之患，始再举兵攻回纥，陷瓜、沙、肃三州。与《实录》‘附传’先后不同，今从‘附传’，但取诱胁酋豪事，增入之。”^⑥除此之外，这里所提到且同于《辽史》“元昊自制蕃书”事，亦可能取自《实录》‘附传’。此外，我们还能确知此种“附传”载于《实录》之中。另外，《长编》庆历元年四月癸未条谓“元昊俾其亲信野利旺荣为书报仲淹，别遣使与周俱还，且言不敢以闻兀卒，书辞益慢”云云，其中就明确指出，“野利旺荣姓名，此据《元昊传》，事盖与《日记》略同，但《实录》、《正史》载此事皆不详尔。”^⑦综上可知，《长编》纪元昊事，多采信《实录》所载《元昊传》。

① 《长编》卷 123，宝元二年正月辛亥，第 2894 页。

② 《长编》卷 123，宝元二年正月辛亥条，第 2893 页。

③ 《宋史》卷 485《夏国传上》，第 13995~13996 页。

④ 《辽史》卷 115《西夏外纪》，第 1523 页。

⑤ 《长编》卷 111，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条，第 2593~2594 页。

⑥ 《长编》卷 119，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条，第 2813~2813 页。

⑦ 《长编》卷 131，庆历元年四月癸未条，第 3114~3115 页。

根据裴汝诚、许沛藻先生研究,《长编》在各朝记事下注引的《实录》,通常就是本朝实录。^①而上文所论及的均是仁宗朝之事,因之,该《实录》应是《仁宗实录》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谓《仁宗实录》二百卷。^②另据《长编》注文,我们可知《仁宗实录》也确实立有“附传”,如大中祥符二年“赵德明帅所部出侵回鹘。常星昼见,德明惧而还”,此据《仁宗实录·德明附传》。^③由此看来,《长编》所称引的《元昊传》,应即《仁宗实录》之《元昊传》。同时,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“《仁宗实录》二百卷,韩琦等修”,^④可见,元人在编撰《宋史·夏国传》及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应该能看到《仁宗实录·元昊传》,而且应该有所参引。综上所述,《辽史》纪元昊事与《长编》所据《仁宗实录》的《元昊传》多能契合,也就是说,元修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纪元昊事所依据的史料最有可能是《仁宗实录·元昊传》。

三

上文分析表明,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元昊纪事是有迹可循的。但是,该书所记西夏风俗居食、军事战斗等材料又源于何处?首先引起笔者注意的是,《宋史·夏国传》所载宋夏交聘及西夏诸帝事应该参引宋代官修史书,亦能见于现存的《长编》和《宋会要辑稿》等文献,但其后附载西夏之疆土、军马、风俗等内容,则少见于它书,然尤详于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。而且,元朝史官曾指明编纂《夏国传》的史料依据,谓“今史所载追尊谥号、庙号、陵名,兼采《夏国枢要》等书,其与旧史有所抵牾,则阙疑以俟知者焉”。^⑤此外,袁楠在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》中还提到《赵元昊西夏事实》、《西夏事宜》等书。^⑥这些信息提示我们,元朝史官在编修三史之时,除了有宋朝遗留下来的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及《会要》等可供参考外,还有看到《夏国枢要》这类专门记载西夏事物的资料。因此,下面将重点考察时存的西夏汉文文献,以蠡测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“西夏纪事”另外的史料来源。

而从宋元以来藏书著录情况来看,有如下两部亡佚宋代文献可能与《辽史》“西夏纪事”的史源有关。

第一部首当是《夏国枢要》。按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曰:该书二卷,系宋朝孙巽纂,主要“记夏虏兵屯会要、土地肥饶、井泉涌涸、谷粟窖藏,酋豪姓氏、名位司存,与夫城池之完缺,风俗之所尚”。^⑦而《宋史·夏国传》谓西夏“其地饶五谷,尤宜稻麦”;“有左右厢十二监军司”;“笃信机鬼,尚诅祝,每出兵则先卜”云云,^⑧以及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“喜报仇”之风俗等等,以上内容与晁氏所云《夏国枢要》记“土地肥饶”、“风俗之所尚”等,多有契合之处。遗憾的是,该书的作者孙巽其人不可考,故而不能确知《夏国枢要》的成书年代。

第二部是《西夏须知》。据《郡斋读书志》可知,此书乃是刘温润在守延州日所“编录伪境杂事”。^⑨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亦著录此书,谓《西夏须知》“凡十五条目”。^⑩清吴广成《西夏书事》还曾引到《西夏须知》,该书卷一四庆历元年纪“元昊知骨披等计不行,归,延德诣延州与范仲淹约和”,注云:“刘温润《西夏须知》‘元昊虽数胜,然亦死亡疮痍殆半,又诛杀不常,肘腋数叛,终不能大斥境土,而中国兵益练习,名将稍出,颇究敌中情状。元昊始欲臣矣,乃归塞门寨主高延德,乞和。’”^⑪又卷二〇嘉祐七年五月“更州军”条,谓“更于西平府设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”,注曰“兹遵刘温

① 裴汝诚、许沛藻《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》,中华书局1985年,第56页。

② 晁公武著,孙猛校证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第229页。

③ 《长编》卷72,大中祥符二年条,第1646页。

④ 《宋史》卷203《艺文志二》,第5090页。

⑤ 《宋史》卷486《夏国传下》,第14028~14030页。

⑥ 袁楠《清容居士集》卷41《状》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,中华书局1985年。

⑦ 晁公武著,孙猛校证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卷7《伪史类》,第292~293页。

⑧ 《宋史》卷486《夏国传下》,第14028~14029页。

⑨ 晁公武著,孙猛校证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卷7《伪史类》,第287页。

⑩ 陈振孙著,徐小蛮等点校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5《伪史类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,第140页。

⑪ 吴广成著,龚世俊等校证《西夏书事校证》,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,第168页。

润《西夏须知》以翔庆军补之。”^①此外，赵逢源云“刘氏《西夏须知》，迄于神宗之世”^②综合《西夏书事》所引两则佚文，我们推测《西夏须知》可能是一部成书于北宋前期而卷帙不大的地理军事著作。^③

另据胡玉冰先生考察，除上述两部书以外，宋人的西夏汉文著述还有刘涣《西行录》、张舜民《南迁录》及《永乐客话》、《西夏杂记》、《契丹夏州事迹》，《西夏堡寨》、游师雄《元祐分疆录》、赵珣《聚米图经》等等。^④此外，明代李维祯藏有一卷《韩范经略西夏始末纪》，^⑤甚至还传云“庆阳李司寇家有《西夏实录》”。^⑥不过从这些书的著录说明及其内容上看，似乎与《辽史》“西夏纪事”的内容相去甚远。而袁桷所提到《赵元昊西夏事实》和《西夏事宜》应当也是记述西夏史的专题文献，但只此一见，这两部书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。

虽然我们尚不知晓《夏国枢要》、《西夏须知》的确切内容，但从零星的文献记载能看出，其纪事多与西夏风俗、地理有关。这里还应指出的是，早在北宋时期就有关于西夏风俗的详细记录。例如，《隆平集·赵保吉传》云：

将出兵，先卜四：一用艾灼羊夹面骨，以求兆，谓之炙勃焦；……三夜以羊焚香呪之，又烧谷火撒之静处，晨屠羊，视其肠胃通，通则兵，无阻心有血则败。^⑦

沈括《梦溪笔谈·技艺》云：

西戎用羊卜，谓之“跋焦”；卜师谓之“厮乩”（必定反）。以艾灼羊髀骨，视其兆，谓之“死跋焦”。其法：兆之上为神明；近脊处为坐位，坐位者主位也。近傍处为客位。盖西戎之俗，所居正寝，常留中一闲，以奉鬼神，不敢居之，谓之“神明”，主人乃坐其傍。以此占主客胜负。又有先呪粟以食羊，羊食其粟，则自摇其首，乃杀羊视其五藏，谓之“生跋焦”。其言极有验，委细之事，皆能言之。“生跋焦”，土人尤神之。^⑧

上文所记述的西夏风俗，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与《隆平集》略同，而《梦溪笔谈》描述则更为具体，其所指可能为同一事。^⑨这说明，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纪西夏风俗所取资的材料可能亦为《隆平集》和《梦溪笔谈》的编者所悉知，故将其整理后收入其中。总之说来，以上诸书所参考的资料有可能是《夏国枢要》、《西夏须知》这类专门记载西夏乡土风貌的文献。

综上所述，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“西夏纪事”由两部分内容组成：其一，纪西夏远祖及元昊事；其二，叙西夏风俗、兵制及军民食用等。从史源角度考察，这些记载与《宋史·夏国传》的取材是相同的，应取资宋朝实录；另外是《宋史·夏国传》曾提到其史料所“兼采”的《夏国枢要》等，以及《西夏须知》，故疑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的部分史料源于这类著述。

（作者通讯地址：陈晓伟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，100871）

① 吴广成著，龚世俊等校证《西夏书事校证》，第237页。

② 同上，第506页。

③ 参见胡玉冰《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》，第31页。

④ 胡玉冰《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》，第33~47、99~108页。

⑤ 祁承燦《澹生堂藏书目》史部上，清宋氏漫堂钞本。

⑥ 钱谦益《牧斋有学集》卷26《黄氏千顷斋藏书记》，收入《钱牧斋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册，第995页；黄宗羲《明文海》卷340《黄氏千顷斋藏书记》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，第5册“补遗”，第5308页。

⑦ 《隆平集》卷20《赵保吉传》。

⑧ 沈括著，胡道静校注《梦溪笔谈校证》卷18《技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，第612~613页。

⑨ 《辽史》卷115《西夏外纪》，第1523~1524页。